

介绍顾颉刚先生撰 《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顾廷龙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不幸逝世，学术界同声哀悼。他在古史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而对图书馆工作亦有很大的贡献。由于他离开图书馆界较久，知者渐希。特述我的闻见，以志悼念！

颉刚先生童年时代就喜欢看书，把祖母给他的点心钱节省下来，跑到旧书店买书，买来便看。上大学读书时，为研究需要搜集材料，看书越多，觉得学校图书馆的书不够了，就上京师图书馆去看书。他读书多了，要研究的问题也日多，而需要的材料越广泛，但每感材料的不足。由于过去的藏书家收书有各自的目的。过去家中积聚一些书的，不外洪北江所说的五等人家，就是考订家、校讎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等。其中考订家、校讎家需要较广博的书籍，其它则各有专门，不为用，而为藏，甚至为了买卖。因此展转流传的，只有经史子集中常用之书，范围是很窄的。

先生是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古代史，二是历史地理，三是民俗学。他要研究史学，必须了解某一事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但在那些经史子集

中反映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古代的材料，只有靠出土文物，而近代的材料，则必须及时地搜集和保存。

不是自己有所研究，就不能理解图书资料的内容，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图书资料的运用，也不会重视图书资料的蒐集与整理，先生对图书资料的真知灼见正是从他对历史科学的博大精深的研究中得来的。

1920年夏，先生毕业北大后，即任本校助教，担任图书馆编目工作。

1927年夏，先生应广东中山大学之聘，任语言历史研究所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学校委托他到江、浙一带收书，他就写了一个《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需要搜集资料的各个方面，并指出它的作用，这就说明了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促使了大家的注意和保存。

1929年秋，先生离开广东就燕京大学之聘。当时所撰的那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印刷不多，后虽印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中，但流传不广，知者不多。曾承见赠一册，我一直宝藏到现在。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这份《计划书》很重要，对图书馆工作者有指导意义，特建议《文献》丛刊将它重新发表出来，希望图书馆从事采访者读之，可以一扩视野，不为传统观念所蒙蔽。

杜定友氏对先生这份《计划书》推崇备至，写了一篇很长的《书后》。略云：

我拜读了顾先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之后，心中十二分的佩服。他这《计划书》的篇幅，虽是很短；但是含义甚深，计划周密。所要说的，都说过了。我对于他的计划，不敢赘一辞。他拟的十六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添减。我只是以图书馆学的眼光，来读这篇文章，觉得它非常的有价值，有意义；值得我们图书馆学的人注意。顾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但是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而且不尚空论，把实际的计划和各类书籍购求之必要，详述无

遗，尤令人钦佩！所以现在把它付印，作为图书馆丛书之一。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

又说：

以上是我读了顾先生的书所发出的感想。我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依着顾先生的计划，去搜罗古籍。本着上述数点，去打破传统观念，扩大图书馆范围，实行科学的管理。这非但于中大图书馆前途有无限的发展，即于中国图书馆界也有重大的贡献。

先生按计划到江、浙一带购书，前后五个月，买到的书约有十一万余册，碑帖约有三万余张，经过一年的整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编了一个专号。先生写了一篇《卷头语》，其中谈到了经史子集以外的图书资料搜集之不易和这些资料不被人们所重视。略云：

到了江、浙之后，努力购书……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

可见当时收购的情况。后以学校速电催他返校，未能继续下去。

先生在燕大任教时还担任了图书馆采购委员会委员，北平图书馆采购委员会委员，并为禹贡学会收购有关史地图籍，边事记载等。对收书工作极为热心。

我服膺先生之说，经常注意到正统以外的图书资料的搜求，

亦略有所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文化遗产。1955年秋季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废纸约二百担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组织人力展开抢救工作，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挑举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1956年1月12日上海《新民晚报》有报导）。选取的标准亦即采用了《计划书》中的十六项。当时抢救出两千斤有价值的文献。这可说是先生的计划在若干年后得到了一次实验。先生听到后，必很高兴，可惜他健在时我没有和他谈及过。现在想起，是一遗憾！

抗战胜利后，先生回到故里，整理藏书，检赠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计八百六十种。其中清末民初之章程、报告、概况、传记及河工、海防等工料、薪粮、公费清册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有抗战时的内地出版物及期刊若干册。特别是他将自己珍藏的《论持久战》一册送给我馆，并手加题跋云：

毛主席这本著作，一九三八年出版于延安。那时我在兰州，承他的厚惠，邮寄给我。奉读之下，恍然于抗日战争所应走的方向。抗战期中，我的生活非常不安定，在甘肃住了一年，即到昆明，又转成都和重庆，直到胜利东归，这册书始终没有离开我。现在我把它重行装钉捐与合众图书馆，作为永久的纪念。一九五三年一月顾颉刚记于上海。

解放后先生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当时该会筹建上海图书馆，聘先生为筹备委员。经常与柳翼谋、尹石公诸先生参加编目校片工作。这都可说明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和热情支持。

先生逝世前十日，我到北京医院去访问他，得知他血压心脏均正常，惟有糖尿之患。那天他精神甚佳，看着小外孙嬉戏为乐，笑着对我说：“我们虽在一地而见面不易。”留我晚餐，临行坚欲远送至电梯，却之再三始回，岂知这次一别竟成永诀。闻耗伤痛，欲写纪念文字，心绪纷乱，笔不成书。今应《文献》丛刊之属，勉述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以贻读者。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